

董正宇 著

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

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现象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

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现象研究

董正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现象研究/董正宇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6

ISBN 978-7-5004-6764-9

I. 方… II. 董…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湖南省 IV. 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9188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 (guoxiaohong149@163. com)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言.....	(1)
一 选题缘起：汉语现代性进程中方言生态危机的产生.....	(1)
二 现象综述：现代汉语文学中泛方言写作观念与实践.....	(6)
三 研究趋势：泛方言写作现象的研究及其意义	(11)

上编 综合论

第一章 自发、自觉与自由

——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类型论	(19)
第一节 自发状态下的方言口语运用	(20)
第二节 自觉意识下的泛方言写作	(25)
第三节 方言话语的自由自在言说	(39)

第二章 方言情结、楚辞传统与边缘策略

——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动因论	(47)
第一节 源自根性的母语方言情结	(47)
第二节 承续久远的方言写作传统	(56)

第三节 自居边缘的文化策略	(65)
---------------------	------

第三章 话语改造与方言出场

——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形式论	(77)
第一节 方言话语的原生态出场	(77)
第二节 方言话语的间接性再现	(85)
第三节 方言成为文本表现对象	(91)

第四章 方言审美与言语效用

——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价值论	(95)
第一节 凸显湘楚语音形象	(96)
第二节 描摹湘地人物神形	(107)
第三节 揭示湘楚文化神髓	(114)

下编 作家论

第五章 语言视域中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论	(131)
第一节 湘西口语：沈从文创作的语言基石	(131)
第二节 乡言村语中的“湘西世界”	
——《萧萧》文本调查	(146)
第三节 语言资源的整合和自由境界的抵达	
——论《边城》	(158)

第六章 主流话语缝隙中民间话语的再现

——周立波论	(171)
第一节 语言原乡的不懈努力	
——周立波语言自我的确立	(172)
第二节 大众文学时代的方言书写	
——论《暴风骤雨》	(181)

第三节 母语方言的自觉书写	
——析《山乡巨变》·····	(190)
 第七章 文化寻根中语言路向的拓展	
——韩少功论·····	(203)
第一节 语言寻根中泛方言写作新路向的探求·····	(204)
第二节 泛方言写作的新收获	
——评《马桥词典》·····	(209)
 第八章 泛方言写作的多向度拓展	
——彭家煌、古华、何顿合论·····	(223)
第一节 开创之功与白玉微瑕	
——论彭家煌《怂恿》·····	(223)
第二节 传统的承续与超越	
——评古华《芙蓉镇》·····	(231)
第三节 粗痞话语的价值与局限	
——以何顿《我们像野兽》为例·····	(242)
 结语·····	(253)
 附论 20 世纪现代汉语文学语言整合的三条路向 ·····	(261)
 主要参考文献·····	(275)
 后记·····	(281)

引 言

一 选题缘起：汉语现代性进程中方言生态危机的产生

方言 (dialect), 俗称地方话, 指的是通行在一定地域的语言。^① 人们早就观察到方言的存在。《礼记·王制》曰: “五方之民, 言语不通, 嗜欲不同。” 东汉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说: “经传之文, 圣贤之语, 古今言殊, 四方谈异也。” 今天, 在第一层次上, 汉语有七大方言, 即北方方言、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和赣方言。七大方言之下, 还有无数的次方言、话、腔等。如同人的血管、树的枝杈, 在漫长的民族社会历史以及文化的演变长河中, 汉语各方言之间声息相通、共存共容、相互作用、相互渗透, 构成一个丰富多样、生机勃勃

^① 方言概念最早大约出现在周代, 就是所谓殊方异语。古希腊语 *dialektos* 是指一个地方居民的话。方言往往与标准语相对称, 它包含三层意思: 一是方言是同一语言的地方变体, 特别是语音方面; 二是方言是不见于书面的特殊口语, 是不够文雅的土语。三是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互有异同, 一种语言往往有多种方言。(袁家骅等: 《汉语方言概要》, 语文出版社 2001 年版; 李如龙: 《汉语方言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方言又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大类。地域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 社会方言是语言的社会变体, 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因职业、阶层、年龄、性别等不同而产生语言的差异。本书所谓方言, 一般都指的是地域方言; 但在具体的论述中, 也包含民歌、谚语、俗语甚至口语等民间形态话语。因此, 本书中的方言不是一个纯粹语言学意义上的范畴, 而是一个相对泛化的概念。

勃的语言生态系统。^①然而,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语言交际的双重需求和作用下,汉语各方言的地域界限被打破,语言求同正在成为当下中国人语言生活的主导趋势;汉语各方言的话语空间和存在格局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一场方言生态的危机随之迫近。

细细看来,汉语各方言的生态环境并非一律恶化。北方方言,无论是分布地域还是使用人口,在各大方言中都拥有绝对优势,生态环境最好。^②打开中国方言地图一看,整个广袤的长江北岸地区包括西南地区只有一种方言——北方方言,其他六大方言全部处于长江以南,而且基本上都是在东南角;从使用人口看,70%以上的中国人说的是北方方言,其余六大方言加起来只有30%。整体的不平衡格局十分明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后华南经济的强势,粤方言也大大改变了自身的“蛮语”形象。粤语歌更是一度成为中国亿万青年的“心声”。相形之下,其他几大方言的生态环境就不那么乐观,均面临程度不等的生态问题。下面以古老的吴方言为例,看看汉语方言的真实生态困境。

困境一是趋同普通话,方言特色减退。江苏是吴文化的重要省份,特色各异的方言是吴文化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推普”的作用下,江苏各地说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普通话的水平也越来越高。同时,各地的方言正在向普通话靠拢。语言学家刘丹青(1995)按使用者的年龄把南京话分为四派:最老派——城南80岁以上老者使用的方言,语音特点跟赵元任《南京音系》所说大体一致;老派——50—80岁之间城南人的方

① 197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E. Haugen在《语言生态学》一文中最早提出“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概念,其宗旨是要“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业关系”,并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环境作隐喻类比。(参看范俊军《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外语教学研究》2005年第2期。)本书所取的“方言生态”概念由此延伸,指的是汉语方言与所在语群、社会及文化环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存发展状态。

② 北方方言强势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历史因素。中原地区一直是汉民族的中心区域,北方方言一直是汉民族的主体语言,历史地位决定了今天的优势。二是国家语言政策使然。《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年2月6日)明确规定:“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了,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在文化教育系统中和生活各方面推广这种普通话,是促进汉语达到完全统一的主要方法。”换言之,推广普通话就是要广泛系统地推广北方方言。北方方言的优势地位早早从国策的高度被确立。

言；新派——20—55岁之间城南人的方言；最新派——25岁以下城南人的方言。他指出了普通话对南京方言的影响，提到城北三区所说的混合型的普通话或新南京话势力日大，城南的方言也迅速变化，形成了南京方言的特殊局面：内部差异巨大，原有方言特色减退，北方话成分日增。这种分析更能深入地反映人们语言面貌变化的真实状况。^①

困境二是方言话语生存空间逐渐缩小。苏州是江苏吴方言的中心，标准吴语的声母有清浊的对立，例如“布”和“步”、“到”和“道”都不同音。但是据语言学家对城区一些年轻人的调查，已经有人不能区分这些不同音的字了。处于分界线上的方言，也正在北化。如溧水、金坛县原本都在吴方言区，但现在两个县城都已普遍说江淮方言（属北方方言），公共交际已不再使用吴方言，老年人之间和农村还有吴方言存在，但已日渐衰微了。此外，江苏还有不少方言岛，据语言学家调查，这些方言岛也正在萎缩。^②可见，作为吴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的吴方言正在日益缩小自己的范围。

困境三是方言的影响力（活力）减退。上海话是吴方言的重要分支之一，正在发生的事实也令人深思。在“推普”的政策下，除了允许沪剧、越剧、滑稽剧等戏曲存在外，报刊不准刊登上海方言文章，一个时期还停止上海话的广播，不准发行上海话歌曲磁带，不准讲上海话的电影电视片播出和方言话剧演出，也不组织专家审定方言用字，因此，上海方言还停留在不见书面语的状态。而上海话原来是一种十分丰富的方言，尤其是近代社会中，上海话中一时造出和引进了大量词语，如“自来水”、“电灯泡”、“马路”、“洋房”、“沙发”、“麦克风”、“文化”、“经济”，等等，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现在却到需要保护的时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室主任周蕾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表面上看，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仍然有千万以上的人在说上海话，而实际上，使用上海话的范围越来越小。任何来自书面或者媒体的信息，都要用普通话表达。上海话只能用在几乎没有文化层次的吃饭、睡觉之类狭小的日常生活范围内。他认为，

① 刘丹青：《南京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② 郭熙：《对新时期“推普”的一些思考：以江苏为例》，《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2期。

长此以往,会造成上海方言的词汇贫乏,从而导致上海话走向名存实亡的不归路。专门研究上海方言的钱乃荣也举出了佐证,根据他的统计,上海话中有特色的,而在普通话中没有的单音动词,其中有74个词在现今大学生一代中已消失不再用了^①。

发生在吴方言上的事实,同样在闽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和赣方言中发生。这些信息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汉语方言的危局正在加剧。

汉语方言的现代性生存困境无疑与20世纪汉语现代性建设历程紧密相关。宏观之,在20世纪汉语现代性建设工程中,从晚清民初的白话文运动到五四时期国语的倡导,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推普”运动的兴起,想象、规划和建设一种现代的标准的“普通话”始终是一代代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共同的理想;当然,在不同时期,“普通话”一语可以表现为“白话文”、“国语”、“大众语”、“现代汉语”等不同口号。正是这种关于“普通话”的想象、规划与实践,一直压抑着作为民间语言的方言,“以方言口语为特征的‘地方形式’被纳入到一种普遍语言的规范之中”,“方言和口语的运用必须服从这种普遍主义的逻辑”,因此,“方言问题始终不是中国现代语言运动的核心问题,毋宁说,克服方言的差异才是现代语言运动的主流”。同时,现代语言运动的主流“不仅是以消灭口语的多样性为代价的,而且还伴随着一种文化上的过滤”^②。微观之,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后,“推普”活动正式启动。半个世纪来,“推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代代中国人接受普通话教育,普通话正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语言生活的首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语言规范的程度,是衡量这个国家、这个文明程度的标记之一;一个地区对民族共同语的普及程度,也同样是衡量这个地区文明程度的标记之一”^③。在国家语言文化战略的支配下,语言规范化意识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客观地看,“推普”活动的确在推动现代国

① 罗雪挥:《拯救方言》,《新闻周刊》2004年第30期(总第192期)。

② 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页。

③ 郭熙:《对新时期“推普”的一些思考:以江苏为例》,《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2期。

家一体化进程、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在一波接一波的现代语言浪潮中，语言求同趋势被简单置换为学习、使用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一场激烈的语言竞争在民族共同语与方言之间以及各方言之间两个层面同时展开。结果是：在中国人的语言生活中，高谈阔论“方言”似乎是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的确，与强势的民族共同语相比较，形形色色的方言总体上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持方言者或者带有方音者在社会交际中始终如次等公民、劣等公民，处于一种言说的“禁忌”状态，不敢多语，不敢大声语，唯恐暴露其方音底色。方言所依附的语言生活土壤似乎正在向“盐碱化”发展。

众所周知，语言的确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规模得以扩大，就形成了所谓的语言传播。在一般情况下，任何一种语言，不是在传播，就是在缩小使用的范围。而在同一时空语境下，一种语言的传播常常导致别的语言缩小使用范围。自从1955年开始推广普通话，汉语方言的话语权就逐步被削弱；在之后的城市化进程中，方言更被打上了浓重的乡村烙印。普通话的传播所带来的另一面必然是方言的萎缩。从这种意义上讲，方言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语言和语言之间的较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全球化的年代，人类必须推出一种公共语言去参与更大范围的交流。就世界范围而言，强大的无处不在的英语正在成为国际通用语；在中国，确定以北方方言为根基的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同样有其必然及合理的因素。

但是，从汉语发展的角度来说，方言话语空间的缩小和趋同于普通话，可能会影响到汉语的生态。所谓的“现代汉语”，指的是现代汉民族的语言，包括现代汉语共同语（普通话）和各种现代汉语方言。现代汉语方言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变体。与普通话相比较，方言的分布范围有大小，使用的人口有多少，在社会生活中使用时势力有大小；然而就其性质而言，并无优劣高低之分，对于所处方言区域的人来说，方言作为其母语，承担着重要的言语交际作用，是他们生活中最习惯、最自然的交际工具。如果把普通话、方言的共存视为一种生态链，普通话和方言正是在相互接触、相互影响中得到各自的发展。即使是今天，普通话仍然在从方言中汲取营养，方言已经成为普通话新词构成的重要途径。比如“搞”字

本为西南官话，20世纪以来进入民族共同语，现在已成为一个广泛使用的万能动词。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方言，普通话就成了无源之水。维系方言的生态平衡，让各方言拥有自由的发展空间，同样也在为汉语的发展提供空间。

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进一步看，开展语言、方言生态保护对民族文化、社会历史等研究也有重要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2001年11月2日通过的《文化多样性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宣言》同时强调，文化多样性是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个人和群体享有更加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和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捍卫文化的多样性与尊重人的尊严是密不可分的。每个人都有权利用自己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由于地域的阻隔和分离时间太长，汉语各方言之间差异很大，特别是像北方话和粤语、闽语的差别。赵元任当年就指出：“从哈尔滨到昆明，从重庆到南京的官话区，言语还比较一致，可是东部和南部方言之间的差别，不亚于法语之于西班牙语，或者荷兰语之于德语。”^① 这些形形色色、相距甚远的方言，是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载体，而正是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激励和竞争，构成了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内在机制。所以，保护方言，就是保护民族多样性的文化，也就是捍卫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

总之，在21世纪的今天，关注和研究方言，不应只是寥寥几个方言学家的事情；本书选择从方言的角度对一个地域的文学进行研究，不仅仅是一个研究角度的创新问题，更有着一份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焦虑感。

二 现象综述：现代汉语文学中泛方言写作观念与实践

泛方言写作在20世纪中国现代汉语文学，特别是湖南文学中的真实存在，构成了本书选题的依据和可行性保障。

^①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80页。

所谓“泛方言写作”，是相对于《海上花列传》、《九尾龟》等纯粹的方言文学作品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在现代汉语文学中大量使用方言口语资源（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乃至语调、语气等）进行文学创作的现象。需要指出的是，当下不少学者习惯的用语是“方言写作”，但笔者认为，这种提法容易给人以方言写作就是方言文学的印象，故加上一个“泛”字以示区别。同时，从五四以来的现代汉语文学事实观察，虽然不同时代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有方言文学倡导的零星声音，但纯粹意义上的方言文学作品少之又少，不成阵势，用“泛方言写作”这一概念更能涵盖这一文学事实。

五四新文学的崛起过程，是中国文学原有的语言基石——文言文（古代汉语）被白话文（现代汉语）取代的过程。方言之于现代汉语、现代文学的作用受到新文学开创者们的一致肯定。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大主义”之一，就是“不避俗语俗字”。他说：“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胡适同时认为，正统文学要发展，“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它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①。周作人1923年提出“乡土艺术”时，就倡导要把土气息泥滋味表现在文字上。在1925年9月6日的《国语周刊》上，周作人发表《理想的国语》一文，重申：“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在周作人这一宏阔博大、极富前瞻性的语言建设视野中，方言被纳入其中^②。钱玄同也在同期发表的《吴歌甲集序》中指出：“方言底本身，它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方言文学底本身，它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它们的价值，与国语跟国语文学同等”，对方言文学表示了“极热烈的欢迎”。同样，当刘半农发现和重印上海话章回体小说《何典》时，鲁迅为之作序。鲁迅称赞书中大量生动的上海话四字格熟语的运用，他说：“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

① 胡适：《吴歌甲集序》，《国语周刊》第17期，1925年10月4日。

②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

髓，随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①也肯定了方言之于文学创作活力的价值。

但新文学的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新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以方言为语言形式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方言俗语只是零星点缀在部分乡土小说的对话语言中。泛方言写作整体上并没有形成气候。做出重要尝试的只有刘半农，他在方言诗歌上大胆进行了实践。他曾亲自回家乡从船夫之口采集《江阴船歌》二十余首并公开发表，而且模仿家乡民歌（“四句头山歌”）的声调和体式，运用家乡（江阴）方言所作的《瓦釜集》，情真意切，有着“正统”文学所没有的朴素气息，较好地弥补了五四新诗的缺陷，从而确立了“民歌体”诗在现代汉语文学中的地位。刘半农由此对母语方言艺术深有感触：

语言在文艺上，永远带着些神秘作用。我们作文作诗，我们所摆脱不了，而且是能运用到最真挚的一步的，便是我们抱在我们母亲膝上所学的语言；同时能使我们受最深切的感动，觉得比一切别种语言分外亲切有味的，也就是这种我们的母亲说过的语言。这种语言，因为传布的区域很小（可以严格地收缩在一个最小的区域以内），而又不能独立，我们叫它为方言^②。

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大众化、民族化时代语境的风云际会下，以北京作家老舍，四川作家沙汀、李劫人，湖南作家沈从文、周立波等人代表，泛方言写作才在中国文坛形成一种极富影响的创作思维方式和语言模式。泛方言写作的成果显著，有《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淘金记》、《死水微澜》、《萧萧》、《暴风骤雨》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在这种成绩的鼓舞下，各地方言文学的创作也得到提倡。如1947年华南地区兴起方言文学运动，1948年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方言文学研究会，次年模仿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样式发起关于

① 鲁迅：《〈何典〉题记》，《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② 刘半农：《〈瓦釜集〉代自序》，《语丝》第75期，1926年4月。

方言文学的讨论与推广运动，并发表了一些粤语小说及诗歌、杂文。此阶段方言的意识形态功能被茅盾、郭沫若等人空前强调，方言上升为文学大众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①。

就总体而言，方言土语在现代语言运动中的危机和困境，在现代汉语文学写作上也有相应的体现。如果说在中国文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型过程中，泛方言写作还占有一定的领地，并受到不少人提倡的话；那么，自从在如迅雷闪电的新文化运动浪潮中文学革命以一种语言革命的形式迅速取得成功，白话文在文学领域就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在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图景中，五四白话文学的提倡很快上升到“国语文学”建设的高度^②。泛方言写作的生存空间并不宽裕。随着延安解放区的奠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工农兵”方向的引导下，强调文学语言的大众化、口语化算是给方言提供了一块保留地，也为方言土语在文学中找到了存身的理据。然而，一个更为明显的事实是，“方言土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而掌舵的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未能占有中心地位”。^③因此，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运用方言土语的文学书写遭遇尴尬和困境。原因有二：第一，是新的国家政权建立后突出强调建立标准语、强化语言的统一。20世纪50年代国家语言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倡语言的规范化，在民众中大力推广普通话，1956年现代汉语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正式确立^④。这个方略对推

① 参见茅盾《杂谈方言文学》，郭沫若《当前的文艺诸问题》，转引自静闻《方言文学运动的新阶段》，《方言文学》，新民主出版社（香港）1949年版。

②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中提出，白话不但“可以用来创造中国现代和将来的文学，并且要用那‘国语的文学’来做统一全民族的语言的唯一工具”。尽管胡适本人不排斥并一度提倡泛方言写作，但“国语文学”的口号客观上必然排斥各种方言话语在文学中的存在。

③ [日]坂井洋史：《致张新颖谈文学语言和现代文学的困境》，见林建法、乔阳《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上），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74页。

④ 《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年2月6日）明确规定：“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了，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在文化教育系统中和生活各方面推广这种普通话，是促进汉语达到完全统一的主要方法。”

进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民族经济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较少考虑到在文学中方言使用的特殊性,因而出现了过分限制方言发展的倾向;第二,“十七年”文学在整体上过多地受到了政治的限制,作家的个性和独创性都未得到充分发展。文学的兴趣更多的是放在迎合政治的需要上,人们关注比较多的是写什么,而不是怎样写,方言问题自然不会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当然,在“十七年”,也不是没有人关注方言问题,像赵树理、周立波、马烽、西戎、刘绍棠等,在创作中还是比较注重方言的使用,方言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一般的文学作品中都能寻出几个方言词汇来。但是,总起来说,“十七年”作家缺少那种将方言作为重要语言资源的意识,缺乏那种多方面开掘语言表现功能的动力,因此,对方言的探讨不可能积极与主动。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的文学已经徒有其名,文学语言已经完全政治化、板结化,它就更不可能在方言中寻找什么表现力了。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文学“寻根”潮流中,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再次受到不少作家的重视。他们“试图从大众的语言中寻找中国文化的原始面貌和发展过程,怀有人类史社会学意义上的用心,并力图将此反映出来”^①。但他们似乎更愿意在作品文化品格的内涵上下工夫,却很少能从语言本身着手,将一种语言深入骨髓并自由地表达出来。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方言”作为一种自由自在的民间话语资源为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采撷和运用,李锐、莫言、张炜、阎连科、贾平凹、韩少功等不约而同地采用方言进行写作,并创作出了《无风之树》、《檀香刑》、《丑行与浪漫》、《受活》、《秦腔》、《马桥词典》等一批有着鲜明的方言色彩的文学作品,泛方言写作一时成为世纪之交文坛的热门话题。

值得关注的是,或源于根深蒂固的母语方言情结,或出自自觉的文学话语创新意识,或受湘楚文学源远流长的泛方言写作传统影响,在现代湘籍作家中始终有着泛方言写作这样一股滔滔巨流。以彭家煌、沈从文、周立波、韩少功、古华、何顿等现代湘籍作家为代表,以《边城》、《萧萧》、

^① 王安忆:《我读我看·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

《暴风骤雨》、《山乡巨变》、《马桥词典》、《怂恿》、《芙蓉镇》、《我们像野兽》等为代表性文本，现代湘籍作家在泛方言写作上创造出了种种方言话语表达式。从中，可以看到地域方言和地域文学的源结纠葛、互生互存的密切关联，也能看到方言话语之于现代汉语文学的巨大补充力量和活力作用，更能看到现代湘籍作家对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文学所作出的种种贡献。

三 研究趋势：泛方言写作现象的研究及其意义

事实上，在“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注重文学形式特别是文学语言的研究，始终是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热点。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欧美“新批评”，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到女性主义，西方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在语言学影响下的多元化的文学研究的热潮。这股世界性的借鉴语言哲学、语言学成果进行文学研究的热潮同样影响了我国的文艺美学、文学批评、文学史等方面，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世纪之交，在网络时代“汉语的危机”^①的呼声中，从五四文学革命的语言变革起点出发，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现代化进程的关注以及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文学建构之于新世纪文学的开拓作用已成为近年学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郑敏、郅元宝、王一川、张卫中等人的研究更新了人们对语言形式以及中国现代文学语言资源、语言策略和语言形象的认识。

郑敏发表《汉字与解构阅读》（《文艺争鸣》1992年第4期）、《语言观念必须更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与诗意价值》（《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等论文，全面而系统地阐述汉语的审美特性和诗意价值。文中不仅以生动的比喻描述了汉语的感性魅力，而且通过汉语与拼音文字的比较，对汉语（汉字）的本质做了完整的阐发，论述了汉语的诗

^① 朱竞编：《汉语的危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编者序提出要“拯救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汉语”；该书收集了当今的许多学者专家关于汉语问题的系列文章，其意图旨在引起人们对于汉语的现实处境的关注和解决策略的思考。